

第一章 金字塔与《圣经》

拿破仑对站在埃及金字塔前面的士兵说：“5000年的历史正注视着你们。”5000年之前，在这片沙漠的边缘上，人类完成了自古以来最引人注目的一项工程。金字塔在工程学和建筑学上是一件完美之作，令参观者瞠目结舌。只要不忘记当时的建设者仅有的建筑材料、建筑工具和运输手段，人们就很难弄明白，他们究竟是怎样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的。

建成之后，金字塔不得不经受时间的考验，不得不对人们的想像力。金字塔看起来成功地应付了这些挑战。虽然所有金字塔都需要整修，有些已遭到时间和气候的破坏，但它们仍然在激发着人们的想像力，被视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从工程学角度而言，金字塔代表着人类成就的一个顶峰，反映了从局部性向普遍性的转变。但是，从社会的观点看，金字塔体现的则是人类生存的一个最

低点。建造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部分原因是表达对死者的崇拜。说得更确切一点，是表达对死去的法老的崇拜。这些法老在世时奴役臣民，死去后仍要求臣民崇拜他们。这些统治者还在世的时候，就通过强迫劳动竖起这些巨大的墓碑，以确保自己得以永垂不朽。建造金字塔的唯一目的，就是赞颂法老，用常人难以承受的沉重的石头展示统治者的辉煌与威严。这些残暴政权不受法律和程序的限制，主要考虑的是统治者自我。他们强迫全国上下都要对自己表示尊崇。谁若不从，谁就得面对严酷的命运选择。如果将统治者的姓名从绝对专制政权中抹掉，那么，金字塔的内容与价值也就荡然不存了。我们必须从这样的背景出发来了解金字塔：建造金字塔并非要使人们的价值观永存，而是使这些统治者的精神永存。这也就是说，荣耀要么属于统治者的精神，要么就属于统治者本人。除了修建金字塔之外，这些统治者再也没有别的办法来显示自己的荣耀。金字塔的建造对建筑学和工程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却给自由以致命的打击。

就我们所知，金字塔建造之前、之中及之后，古埃及都没有发生过奴隶造反事件。为什么奴隶们无可奈何地接受了他们的命运？这样一座“为奴之家”是怎么形成的？

孟德斯鸠不仅对分权理论的确立作出了贡献；他

也研究过地理条件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他的研究受到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进化论不仅适用于个体，也适用于整个群体。结果，在 19 世纪的欧洲，出现了地理决定论学派。这一学派力求从环境条件决定法律的角度来解释国家之间的差异。根据这一学派的解释，是物质环境造成人类社会的特点与发展。作为这个学派的一员，这位法国历史学家将世界各国的人口分为两种：平原人与山地人。由于平原上没有任何遮掩，造反作乱的地理潜能就极端有限。如果这块平原上只有一条河流穿过，就像尼罗河那样，所有农民都依靠河水为生，他们必须公平地分享河水，这样，这些平原上的居民之间就特别需要合作。山区的情况就不同了。在那里，峭壁和洞穴提供了藏身之处、伏击之点与大量进攻和防守的可能性。如果说平原孕育遵纪守法的话，那么，山地则是养育反叛者和预言家的家园。一些从不循规蹈矩的哲学家正是在这里产生的。

金字塔所在的尼罗河三角洲影响到生活在该地区的居民的性格，促使他们逆来顺受，接受现实。尼罗河两岸的居民，将他们的聪明才智用来巧妙地开发那里的自然资源。在该地区漫长的历史上，很少有反叛或争斗发生。一个个统治者来复去，一个个帝国兴而衰。可是，金字塔巍然不动，仍然俯瞰着这片广袤的平原，好似象征着总是需要赞同，即使以屈从为代

价。这一地区最终形成的地理特点和社会结构，为在埃及的国土上出现“为奴之家”创造了条件。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是金字塔社会的物质明证。在这个社会中，被认为具有神性的统治者法老，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集中并使用强力来控制那些修建宏大建筑物所需要的劳动力。修建那些宏大的建筑物其实别无他图，只为实现他那妄自尊大的野心。

埃及尼罗河三角洲地带的地理特点，使其成为一个遵纪守法的地区。因此，并不令人感到惊奇的是，这一地区几乎没有发生过叛乱活动。

根据犹太人的传说，我们的先祖离开埃及的时候，金字塔已经巍然屹立在那里。他们离开“为奴之家”，去寻找“美好之地”。在沙漠中彷徨的时候，他们得到《托拉》。^①从多种意义上说，《圣经》讲的就是《出埃及记》的故事，描绘一场反叛活动的情况。反叛开始的时候，摩西站在法老面前，要求“容我的百姓去”。这场反对控制和奴役、反对崇拜法老、反对崇拜偶像的反叛活动，发生在许多代人一直屈从于上述这些做法的土地上。《托拉》要求我们牢记走出埃及这件事。而走出埃及之后产生的口头的和书写的民族文化，确立了“牢记走出埃及”为民族特性的中心和希伯来年历的基轴。安息日和各种节日，甚至赎罪日，都被限定在“牢记走出埃及”的范围。公元 2

世纪,《密西拿》确定,“每一代的每一个人都必须这样想:当年走出埃及的,好像就是他自己”。^②12世纪,犹太民族最伟大的哲学家迈蒙尼德又说,每一个人都必须将自己视为“刚刚从埃及的奴役中走出来”。^③因此,对走出埃及的记忆,不只是一个历史问题,而是一种确定的行为准则。这种准则之重要,不只体现在民族层面上,也体现在个人的良知上,广而言之,还体现在个人将自己视为自由存在的方式上,体现在他们对他人、对社会应尽义务的理解上。摩西在把整个民族作为单数而讲话时说:“你也要记念你在埃及地作过奴仆。”这种记忆当能决定个人的行为,因为这是一种活生生的记忆。这种记忆来自往昔的良知,通过现在,造就未来。摩西直接面对的是未来,而《密西拿》强调的是过去,迈蒙尼德强调的则是现在。哈西德派创始人以色列·本·以利撒美名大师说:“由于健忘,流亡在继续。赎罪的秘密在于牢记。”^④活生生的记忆将把赎罪带给个人与社会;而根据从埃及出走模式,也把赎罪带给犹太人和整个世界。犹太教正统派哲学家亚伯拉罕·伊扎克·库克拉比认为,安息日既是对创造行动的一种纪念,也是对走出埃及的一种纪念。^⑤前一种纪念具有普遍的意义,而后一种纪念则具有特定的意义。

从许多方面来说,这是一种具有双重意义的出

走：从法老的奴隶王国出走，从人们心中似乎是固有的为奴王国出走。根据犹太人的传说，从开始摆脱“为奴之家”到走进“应许之地”，一共花了 40 年时间。《出埃及记》的故事从摩西同法老进行政治谈判开始。谈判有时在理性的基础上进行，也就是说，通过理性的政策进行；有时则通过奇迹和威胁进行，也就是说，在非理性框架内进行。然而，一旦出走真的开始，摩西被迫再次进行谈判，但这次谈判是同他自己的人进行。这些谈判延续了 40 年时间。为尽力使人们相信他选择了正确的道路，作为领袖人物的摩西再次施展两手，既进行理性争论，也采取超自然的魔法手段。谁也难以断定，逻辑比奴役更有力量。

对以色列人来说，穿越将“为奴之家”同“美好之地”隔开的有形的沙漠非常困难。看来，他们发现，穿越将为奴王国同自由王国隔开来的心理的荒原也同样困难。多年以来，人们已逐渐习惯于受奴役，已学会将自己的行为、期望和价值观同肯定是很严酷的现实相适应，并且还在相当程度上确信，他们的现在和未来如何，只有仰仗统治者。走进自由王国，就是自己为个人的命运、为人民的共同未来承担责任。要做到这一点，显然还没有把握。在人们从为奴王国走向自由王国时，变革的进程也就启动了。当然，变革引起不安，被视为隐含着威胁。这是因为人们对变

革的局限性不熟悉，对变革可能会带来什么不知晓。人们总是难以适应变革，而人们离开埃及时的特定情况肯定使这种适应性变得更加困难。他们向往持续稳定，向往那个熟悉的世界，向往那些他们已经逐渐了解并接受的行为规范。他们早已熟悉刚刚离开的那片土地。虽然那是一个“为奴之家”，他们也逐渐知道了自己该期待什么，该如何行动。两相比较，那“应许之地”是一个遥远、生疏的目的地。获得解放的奴隶们怀疑自己有无能力到达这片土地，有无能力经受解放过程要求他们必须经受的苦难。

人们很难理解，摩西和那些以色列子孙为什么需要 40 年才穿过西奈沙漠。本来，沿着海岸走的最短路程和穿过旷野的较长路程，如果四周的时间不够，用四个月的时间是会走完的。《托拉》就此解释说，那些以色列子孙不得不穿过沙漠走一条较长的路程，以避免发生同非利士人打仗的危险。这些以色列子孙还没有为争取自由而战斗的能力，他们也许宁愿受奴役，也不愿意冒打仗的风险。可是，不管他们走哪条路线，以更快的速度走完全程本来是可能的。然而，摩西却喜欢在沙漠中徘徊。这正如《托拉》所说：“他们走一程停一程。”他拒不缩短预定的穿越时间。一个领导人的伟大之处，有时就在于对时间和时机的洞察。他认为，一段很长的时间需要的，要一直等

到在“为奴之家”诞生和成长的“那整整一代人完结”。只有这样，犹太人才能在体魄上和思想上都作为一个自由的民族走进以色列国。

摩西认为，为了从一种极端状态过渡到另一种极端状态，等待是必要的，要一直等到不只是被奴役的那代人，而且还有身处沙漠的那代人，也就是处于过渡时期的那代人，全都从世界上消失。身处沙漠的那代人，清除了传染到被奴役那代人心脏的奴役病毒，肩负着争取自由的希望。身处沙漠的那代人一边往前走，一边回头看，眷恋着那“埃及的肉锅”。^⑥他们心情烦躁，愿意再次膜拜金牛犊。^⑦身处沙漠的那一代人面临的困难，象征着将习惯同变革联结起来的狭窄的桥梁。

人们的记忆力很差。刚跟随摩西走出埃及，他们就开始认为过去的一切好像都从未发生过，把埃及看成他们靠“肉锅”过活、面包“吃得饱足”的地方。备受奴役的生活突然变成了近似具有田园情调的日子。由于对生活在沙漠中的困难准备不足，又没有能力打败非利士人，他们逐渐对离开埃及感到后悔，甚至开始散布摩西的谣言，怀疑他的领导能力。在他们的领袖爬上西奈山同上帝独处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埋怨说：“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他也许不是什么伟大的赎罪者；他也

许只不过是那个乖僻的梦想者？

这些批评反映出来的是烦躁情绪和不想面对前途无定的意愿。这种政治性的批评很快就变成了神学上的批评。为什么摩西给他们带来一个无形的上帝？他们渴望看到的是已经非常熟悉的那些有形的、物质的、朴实的神祇。他们很快就摘下自己的首饰，要求好心的祭司亚伦将金子熔化，铸成一个金牛犊。在亚伦满足他们的要求之后，他们就围着金牛犊跳起舞来，高兴地叫喊道：“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反动同进步从来就难以分开。

他们宁愿回忆他们曾经拥有的东西，或者说，回忆他们现在想像中曾经拥有的东西，而不愿意在无名的沙漠中游荡。往昔并没有什么令人惊奇的东西。最容易做的事莫如利用追溯来美化过去。大自然赐给人类的，不仅是记忆的能力，还有忘却的能力。这两件赠品总是同人的命运嬉戏，招来希望和失望，既有实在的希望和失望，也有想像的希望和失望。相比之下，未来却不是记忆的产物，而是想像的产物，招来的是恐惧和怀疑。未来建筑在远见、活力、创新和开创先例的基础上。人类总是从自身的经历或从历史的研究中了解往昔。然而，有些方面争辩说，我们没有如实地了解历史上的往昔，文字历史所反映的只是撰写历史的那个时代的观点以及作者个人的品格。历史

学家的视角同样也反映写作时代的时代精神；而这种反映的深刻程度，并不稍逊于他所作的表示，即对作为审视主体的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要尽力理解。

在考虑未来的时候，我们必须参酌一些幻想家和领导人的看法。就连摩西这样首屈一指的先知和最伟大的领导人物，在向人们表达他对赎罪问题的看法时，也觉得自己“素日不能言”，甚至“拙口笨舌”。谈起往昔的时候，嘴巴、舌头和双唇比较容易被理解，也比较可靠。人们可以用毫不含糊的言词谈论往昔，并可以得到普遍的理解。相比之下，谈到未来的时候，就没有权威性的、毫不含糊的、确定无疑的措词发挥作用的余地了。未来只是一种可能，还不是现实。在不确定性的迷雾后面，是历史舞台上那些角色在表演——那些角色自己往往也不知道他们所作决定的重要性。领导者是一些受命应付明天的历史并为其规划航程的人物。人们总是在事后依据政绩对他们加以审视。他们这一行业使用的工具，是具有说服力的言词。从一个领导者的观点来看，某种不能言说的东西就不能实现。与未来有关的言词，具有某种实验性、文本性的价值，而没有预言性的价值。因此，这些言词看来是脱离现实的。这正好说明，为什么每次革命很难赢得多数人的支持。正是从此出发，列宁得出的结论是，他发动的革命，任何革命，都需要一支

先锋队。没有一些先知先觉的人作坚强核心，谁也不会把这种觉悟变成现实。摩西在犹太历史早期所发动的那种革命，西奥多·赫茨尔在这部历史需要延续的时刻到来时发动的那种革命，可以被视为一团火焰，起始显现出光亮，后来就转变为热情。^④然而，在当时，它也被视为一种引起烧伤的火种。这正是为什么任何革命都会既带来希望也带来遗憾的原因。

摩西虽未成功，但一直尽力提醒以色列的子孙们要聆听那位隐形上帝的教化。这位上帝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然而，百姓并不为他的话所动。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

摩西尽力激励百姓，使他们也具有他那样的伟大理想：从肉体上受奴役走向政治自由，从植根于邪恶、仇恨和歧视的个人与感情的痛苦中得到自新。他根据互助、道德准则、公正、真理和人的尊严提出一种人生理想。而且，这种人生以自由选择为基准：“看哪，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活。”

摩西大声向百姓说：“不可心里恨你的兄弟。”他

还号召他们：“要爱人如己。”伟大的密西拿圣哲阿奇巴认为：“爱人如爱己——这是《托拉》体现的一条重大原则。”^⑨换句话说，你可以用这句话，用这句话中充满活力的道德原则，来概括整个《托拉》经典。

摩西还详细阐述了他的道德准则：“你们不可偷盗，不可欺骗，也不可彼此说谎”，“不可咒骂聋子，也不可将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你们不可颠倒黑白”；“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要尊敬老人”，“如有寄居的与你同住，不可欺侮他”，“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要给穷人和寄居的”；“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我民中有贫穷人与你同住，你若借钱给他，不可如放债的向他取利”。此外，每七年取消一次欠债，释放一次奴隶；如果土地所有者由于经济困难被迫卖掉土地，每过五十年，就要将作为农业社会主要生产资料的土地归还原主。

这是根据解放的原则制定的一部新的、毫无含糊其词的社会法。在这里，个人不仅从他人奴役下得到解放，而且也从自己的消极冲动中得到解放；从埃及得到解放，就是从被剥削和受屈辱之下得到解放；从奴隶制度下得到解放，就是使自己不再剥削他人。一个自由人既不会是奴隶，也不会是奴隶主。

摩西警告他的百姓，不要再去崇拜依据人形制做

的偶像。一神教观点认为，人类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塑造的，他们的内心因而也具有造物主的理想形象。人必须一直努力，以达到最高的道德境界。相比之下，偶像是按照人的形象创造的，并能使我们接受其缺陷：妒嫉、猜忌、迷信、战争、追逐荣誉和财富。摩西展示了一神教的理想：上帝是无形的，因而也是不变的；然而，是他创造了世界。他就是正义、真理与和平；我们应该走他的道路，以便提升我们的灵魂。他警告百姓说：“不要转而去崇拜偶像。不可为自己塑造神像。你们要谨慎……唯恐你们败坏自己，雕刻偶像，仿佛什么男像女像……”摩西蔑视那些自信能将神性赋予动物的人。

摩西这番话是向那些具有抽象能力、不需要将他们的上帝物化或实体化的人讲的。正如圣经学者耶舍斯克尔·考夫曼所说：“偶像崇拜的实质是，认为神性就在某种超神性存在的框架中。以色列人信仰的实质是，根本就没有超神性存在这种东西，根本就没有超神性的法律和命运……以色列人信奉的上帝，并非神话中的上帝。”^⑩

摩西知道，并非每个人都会为一种纯粹的道德感召力所吸引。因此，他尽力使用务实的词藻，描绘出一幅美好未来的图景来打动人心。他说：“你们若听从我的吩咐……大地就把收成交给你们……你们就会

吃得足饱。”那美好的“应许之地”是一片“流奶与蜜之地”。这样，摩西就描绘出一个食物充足、丰裕、安谧、和平与安全的未来。耶和华对他说：“我要赐平安在你们地上，你们躺卧，无人惊吓。我要叫恶兽从你们的地上熄灭，刀剑也必不经过你们的地。”

摩西利用规范的形式，利用以世俗的、物质的词句来表达的玄奥理想，为人们确立了一些道德目标。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托拉》决不再仅仅停留在抽象与奥妙的水平上：“此物并非在天界。”《托拉》已经交付给人类，人们必须根据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则采取理性的办法：“服从多数”。摩西没有根据他所具备的先知能力而要求得到任何特殊地位。他对后来继承自己领导地位的忠实信徒约书亚说：“但愿上帝所有的臣民都是先知。”领导人不应该妄自尊大，先知也不应该盛气凌人，因为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因此，“服从多数”的原则不只是一个程序问题，更是一个有关正义与平等的基本价值观念问题。

令人疑惑的是，摩西自己是否“服从多数”。看来，他是在尽力使多数服从于他，当然是通过劝说，而不是强迫。一个领导人必须是领导别人，而不是被别人领导，必须像马拉车，而不是车拉马。一个领导人必须带领百姓奔向一个新的目的地。这个目的地不

仅同以前的情况不一样，而且比以前还要好。

领导人还必须呼吁人们选择自己的目标。“我今日将福与祸明陈在你面前”——他要使他们能够自由选择。自由选择的观念是圣经思想对人类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自由选择的观念认为，人们已经学会分辨善与恶，享有自由的个人要为自己行动的后果负责。这样，决定一个人在世界上地位的，并不是某条古代的律令，也不是盲目的命运，而是这个人的选择、行动和成败。自由选择建立在自由意志的原则基础上。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作出自己的决定。正如迈蒙尼德所说：“每个人都可能像摩西那样公正，也都可能像耶罗波安那样邪恶；可以是个聪明人，也可以是傻瓜；可以富有同情心，也可以极为残暴；可以很吝啬，也可以很慷慨；还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品德。谁也不会强迫他，命令他；谁也不会把他拉向哪个方向；相反，他要走的路，是凭自己的意愿选择的。”^{9, ⑩}

把人与兽区别开来的，是脱离奴役走向自由的那条道路。人有能力权衡各种不同的选择，并能根据与得失和道德有关的考虑，来确定自己喜欢走的道路。

摩西实现了一场巨大的历史变革，但他不要任何回报。确实，作为一个领导人，他为自己领导的革命的成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看到了前面那片应许之地，但却从未踏上那片土地。摩西死了，“只是到今

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摩西没有墓碑，也没有任何有形的纪念物，更不用说金字塔了。然而，如果将他的遗产同法老的遗产作一个比较的话，人们毫无疑问会发现，谁更为清晰地铭刻在人们的良知之中，谁至今仍在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期盼、信仰和观念。摩西的精神遗产同法老的物质遗产是根本不同的。摩西反对法老的专制统治。他带给百姓的《托拉》，是对这种统治的彻底否定。作为傲慢而遥远的权力的一个象征，金字塔对游客是有吸引力的，但却不会使他们感动。金字塔令人惊叹，但却不会使人认同。《圣经》走近并打动每一个人，赢得人心，开阔心灵。

金字塔尽管质地坚固，仍需要不断维修，修复时间和气候造成的破坏，处理石头的老化问题。《圣经》则不需要这种维修；它能抵御时间的流逝和不断变化的时代精神。金字塔只令人惊叹一时，而《圣经》则永远使人祈拜。

人类面临各种不同的自我奴役。他们是自己情感的奴隶，自己弱点的受害者。他们每一代人都必将经历自己个人的“出走”，离开利用易逝的物质做成的可笑物质偶像世界，走向至高无上的价值观念构成的永恒世界。每个人都必须一次又一次地穿越位于令人感到舒适的谎言与不断探索的真理之间的那块沙漠。法老的金字塔令人难忘，稳固而又坚实。但是，

只有人类道德的金字塔才蕴含着智慧的源泉，才能达到美与力的制高点。精神的顶点远远超过石头的顶点。

每一代人都会创造新的奇迹。对古人来说，金字塔是世界上伟大的奇迹；我们自己时代最伟大的奇迹则是小小的微软芯片。芯片令人震惊，因为它尽管体积小，却能带来巨大变革。它给现实带来的不可估量的影响，远远超过巍然屹立数千年而显然没有什么变化的金字塔。金字塔使我们回溯到远古时代，而微软芯片则召唤我们扬帆走向新的时代，走向人类文明发祥以来从未经历过的一个令人心往神驰的时代。

如果说金字塔创造了时间停滞的幻觉，那么，微软芯片则提醒我们，时间在以几乎不可理解的速度在飞驰，把我们带到以往看来难以认识的新领域，带到现在扩展我们的心智、给我们提供新的机遇和挑战的新领域。

然而，不管金字塔还是微软芯片，都不能取代那个足以维系使我们有别于动物的坚实价值体系。各个时期都需要这样一种价值体系。在科学技术的可能性不管祸福都达到超常水平的时期，尤其需要这样一种价值体系。我们身边存在的各种可能性越多，我们就越有必要具备分辨善与恶的能力，套用《圣经》中的话来说，就是分辨“祝福”与“诅咒”的能力。